

第1章

儿童的发现：随时代变迁、发展的儿童观和童年观

近现代世界文学史上，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只要有儿童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儿童文学”。历史记载表明，尽管古希腊《伊索寓言》、古希腊神话等早期文化遗产绝非为儿童创作，但其中能言会道的动物角色和天界人间的奇幻故事因其与儿童气质相适配的文学性和故事性，成为娱乐和教育儿童的重要文学资源。直至17世纪，对英国儿童图书出版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约翰·洛克在相关论述中还特意推荐《伊索寓言》作为成人为儿童讲述的内容。以此为参照，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作家和艺术家依据儿童及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征和心理接受特征专为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其读者对象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这些作品具有契合其审美接受意识与发展心理的艺术特征，是有益于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表达。与历史悠久的大文学系统相比，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学术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进程无疑是一个新兴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从本质上看，成人社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有意识的关注、呵护和培育构成了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价值取向。当然，这一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伴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伴随着人们对儿童心智发展和审美接受认知的逐渐深化而形成的，更与儿童观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

1.1 儿童观是时代发展和观念进步的产物

法国学者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从社会史视阈考察欧洲的儿童史和家庭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从社会历史角度认识童年的理性范式。在《童年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1962）中，阿利埃斯提出，在近代社会之前的中世纪，人们没有形成“童年”观念，处于“儿童”阶段的孩子没有被社会赋予任何具体形象和存在特征，他们不过是从婴儿走向成人这一过程中的小东西而已（Ariès, 1962）。他认为，中世纪的人们完全无视童年的存在，也不明白童年的特殊意义，更没有因为这种特殊意义而把儿童与成人区分开来：“我们以中世纪社会为研究的出发点，在那个社会，儿童观念并不存在。儿童观念与对儿童的爱护不能混为一谈：儿童观念是一种关于儿童特殊性的意识，这种特殊性可以将儿童与成人做出基本的区分。这种意识在中世纪并不存在”（Ariès, 1962: 128）。事实上，在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儿童基本被视为“缩小的成人”“预备劳动力”“还未长大的人”，完全是成人眼中的“他者”，童年期特殊的生理状态和精神需求长期以来受到成人社会的忽视，更遑论得到关注和研究了。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成人群体对儿童及童年的普遍看法和态度构成了特定意义上的儿童观。其中，有自觉意识的儿童观的形成和演进，必定受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思想文化发展状况，以及人们对所处的特定时代社会关系中人类自身认知发展状况的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人们只有在首先满足了衣食住行的需求之后，才能从事科学、艺术、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活动。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有自觉意识的儿童观，尤其是有自觉意识的童年观一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形成的。事实上，近现代儿童观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演变的，这一进程的背后存在深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主要涉及有关儿童、童年、家庭的认识，以及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观念的产生和碰撞。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观就是生活在工业革命社会转型期的

人们对儿童及童年等观念的总体反映和新的理解。与英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观无疑经历了质的变化。从清教主义的“原罪论”儿童观，洛克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童年纯洁”与“崇尚天性”这样的儿童教育观，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童心崇拜”，到工业革命时代“重返童年”思潮的出现，不同认识层面的儿童观导致了不同的儿童文学图书创作理念和童书出版实践，并且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激烈碰撞，最终引发了一场儿童文学革命。从历史文化语境审视，儿童观的发展经历了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心理学与哲学的发现，再到儿童精神分析学和无意识理论的出现这几个阶段。

1.2 第一层面：“儿童不应简单被视为尚未长大的成人”¹

在现代儿童观形成之前，儿童一般被视为社会的预备劳动力，是尚未长大的成人，所以人们根本不会去思考儿童是否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人格。这种“预成论”儿童观认为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仅在于儿童的身体还没有长大，同时他们的知识还十分匮乏，需要成人的教导而已。既然儿童不是一个在身心发展上有别于成人的独立存在，人们自然不会想到儿童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需求。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自然不会有人去专门研究儿童的审美需求，更不会专门为他们创作与其身心发展相适应的文学作品。作为基督教教育哲学的奠基人，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从基督教观念出发研究真善美，通过柏拉图哲学和《圣经》等探讨善恶问题，他的教育思想对欧洲中世纪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理论基础。奥古斯丁认为在上帝面前，没有人是纯净无瑕的，即使刚出生的婴儿也不例外，儿童表现出来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稚嫩而表现出来的假象，而非本心纯洁，所以对于儿童的教育要采取惩罚手段，这也成为中世纪人们恐吓和鞭打儿童的理

1 有关成人社会儿童观发展的三个层面问题，参见《走进童话奇境》（舒伟，2011b）。

论根源。他还提出，为了获得未来天堂的幸福，人们应该无条件敬畏上帝，实行禁欲，特别是对于儿童来说，应当从幼年起就抑制他们嬉笑打闹、游戏娱乐的冲动，并采取严厉措施来加以遏制。

16世纪以来，随着新教主义以及英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人们对儿童精神状态的漠视态度有所改观。不少人出于基督教的理念开始关注儿童心理，其出发点主要建立在基督教原罪观念之上：儿童不仅是还没有长大的小人，更被看作是心理不稳定的、具有邪恶冲动的、需要被救赎的个体，尤其儿童的灵魂应当得到救赎。例如，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创始人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就承袭了奥古斯丁的“原罪论”儿童观，认为儿童是带着罪孽来到这个世界的，因此对于儿童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清教徒（Puritan）一词源于拉丁文的 *Purus*，出现在16世纪60年代，在英国指信奉加尔文主义，将《圣经》（尤其是1560年的英译本）奉为唯一最高权威，要求清除天主教体系内旧有仪式的改革派人群。清教主义者大多看重家庭生活，关注子女后代，尤其关注孩子的精神和道德教化。正是受清教主义者注重儿童教育的理念影响，儿童图书成为独立的出版类型，主要包括宗教训诫类图书以及实用性、知识性图书。出于让儿童接受基督教教义的需要，人们开始关注儿童的读书识字教育，认为儿童读物能够影响儿童的人生，尤其是获得救赎、通往天国的虔诚人生。

1689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发表的《论人类的理解问题》（*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开始改变人们传统的儿童观和对待儿童的固有方式。洛克提出，人的心智的形成需要将观念与经验联系起来。他认为婴孩的心智犹如一块空白的书写板（*tabula rasa*），如同一张白纸，而非充满先天固有的思想，因此各种观念和习惯都可以填写在上面。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肯定了童年的重要性，而且有助于推动人们摆脱清教主义原罪论的桎梏，解放儿童的心灵。洛克发表的《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1693）主要涉及儿童的道德和人格教育，对英国18世纪的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洛克在书中论述了如何通过三种独特的方法来培育儿童的心智：发展健康的体魄，形成良好的性格，选择适宜的教育课程。在培养方式上，洛克认为儿童的阅读应当具有愉悦性，而且儿童

的学习过程可以是愉快的。洛克的影响是划时代的，是深远的。他的观念在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洛克对于特定知识的详情细节的强调，对于认知逻辑的细节的重视，在作者对鲁滨孙经年累月的孤岛生活经历的描述中得到生动细致的体现。他在岛上种植大麦和稻子，并制作能够加工面粉的木臼、木杵和筛子。有了面粉就可以烘烤出面包，尽管是非常粗糙的，但足以满足日常食用。他驯养野山羊，并在此基础上扩大规模，在荒岛的另一端建起了一个养殖场，以解决奶品和肉类的需求。他还制作陶器等生活器具，进一步提高了生活的便利程度。在荒岛漫长的岁月中，鲁滨孙不畏艰辛，尽心竭力地制作各种生活器具，缝制兽皮衣裳，打造交通工具，修建住宅，开拓种植园和牧场，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洛克的思想观念对英国儿童文学出版业的标记性人物——出版家约翰·纽伯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744年，纽伯瑞迁居伦敦，随即在圣保罗教堂的大院里开设了同时经营印刷出版和发行销售的书店，并致力于开拓儿童读物市场，不久便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专门出版儿童读物的出版商。从儿童图书出版史的角度看，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人们把纽伯瑞开始出版发行儿童图书的1744年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英国儿童文学的开端。这也使纽伯瑞的名字日后与儿童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22年，美国国家图书馆协会专门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年度最佳英语儿童文学作品奖：“纽伯瑞”奖。他在1744年首次出版的儿童图书《精美袖珍小书》（*A Little Pretty Pocket-Book*）的序言中极力赞扬了洛克。中世纪和清教主义语境下的儿童图书主要依照宗教理念进行书写，而洛克则倡导表现儿童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面临问题时做出自己的选择，并采取行动。纽伯瑞于1765年出版的《一双秀鞋》（*Little Goody Two-Shoes*）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如何通过读书识字成为一名教师并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

在洛克之后，法国思想家卢梭对改变传统儿童观念起到了很大作用。卢梭发表于1762年的《爱弥儿》（*Emile*）一书是一部描写儿童生活，尤其是儿童的教育与成长的传记体哲理小说。在这本书中，卢梭基于洛克的理性教育观提出了“自然教育论”，认为教育应该“归于自然”并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应该尊重并促进儿童身心的自然发展。卢梭提

出的自然开放的儿童教育观以及“高贵的野蛮人”“理想的成人”等观念对改变传统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卢梭的理念标志着人们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有别于成人”的儿童。

1.3 第二层面：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与哲学的发现

20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突飞猛进，人们对儿童心智发展的认识也更加科学和深入。瑞士教育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的发生认识论，从儿童心理成熟的过程揭示了儿童的认知规律。根据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6岁到8岁的儿童已经从“前运演阶段”（pre-operational level）进入“具体运演阶段”（concrete operations level），他们在语言运用方面已有很大进步，可以用词语和其他象征符号来表达较为抽象的概念，而经典童话的内容和形式正好呼应了这一年龄段的儿童感应世界的方式，所以对他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皮亚杰的观念对于人们认识原始思维与儿童文学审美创造，探究儿童思维特征与儿童文学审美意识结构的深层因素，都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这有助于人们从前因果观念、任意结合的逻辑思维、儿童的自我中心思维等诸多视角去感悟和把握儿童文学的审美创作。另一方面，哲学家发现了当代社会出现的有关少年儿童学习知识与培育智慧的悖论现象。当代社会的学校教育十分注重知识因素，但在现实生活中，成人为少年儿童灌输知识的同时可能遮蔽他们的智慧，因为知识化不等于智慧化。美国哲学家加雷斯·马修斯（Gareth Matthews）曾这样表述这个两难问题：幼童必须学习常识（知识与经验）。但常识作为前人成熟化的认识结果，对它的汲取又可能遮蔽和消解幼童的思维智慧。马修斯探讨了儿童与生俱来的哲学思维，有助于人们从哲学层面去认识儿童。幼童的思维处于稚拙而神秘的“原始性思维”状态，难以用概念的语言来表现，只能用意象，用他们有意意识和无意识心理能理解的特殊话语来表达、沟通。它的运作完全不受常识的支配和干扰，从而使天赋的智能处于无拘无束的自由飞翔之中，产生了独特的指向，获取了独特的发现。

幼童的天赋智能之所以能进入哲学的境域，是因为他们对世界和对生活表现出的疑惑和惊奇；疑惑之中蕴含着巨大的不解和猜度，惊奇之中蕴含着巨大的求索和发现，从而激发儿童进一步探究世界与发展自我的兴趣。

1.4 第三层面：精神分析学和无意识理论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性危机，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催生了各种人文思潮，也促使人们对以往种种的儿童观念和儿童文学的价值标准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比如人们对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信念产生了深刻怀疑。以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蔚然成势，使文学家和批评家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人类的无意识领域。

20世纪初，就在心理学家致力于建立一种科学心理学的同时，精神病学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但是人们不久就发现，许多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实际上并不需要医药或手术治疗，他们病痛的症结源自精神的苦闷、烦恼或焦虑不安。对于这些患者，精神病医生需要的不仅是医学领域有关人体生理机能的纯医学知识，更涉及大量关于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认知。但是以实验为依据的科学心理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人们的精神疾患是很难用科学实验数据或临床证据进行量化的，精神分析治疗的临床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也是很难查证的。弗洛伊德脱离主流精神医学科学的原因就是他几乎没有掌握任何实验数据，他提供的案例在职业医学人士看来是近乎奇闻轶事的疗程。问题的本质在于，弗洛伊德探寻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这一独特领域，他就像侦探寻求破案线索一样致力于找出精神病患的“病因”，进而对患者实施心理疗法。这种心理疗法的可能性潜藏在人的意识和无意识活动及其显露出来的端倪（蛛丝马迹）之中，通过发现、分析和解释

线索来披露“罪行”，揭示隐情，最终使“病情”真相大白。尽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这一“无以证伪性”使它难以被自然科学者所接纳，但是考虑到人类动机和行为、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奇异性以及人类具有奇特的且难以解释的创造和利用象征的能力，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探索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类的心灵本质和无意识特征。与此同时，历史见证了弗洛伊德对于人们理解童话文学的深层心理意义做出的重要贡献。随着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心理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被用于解析民间童话和文学童话中人类共同的某些隐秘的心理信息。在儿童文学语境中，童话关联着“梦”和“无意识”，这正是来自现代精神分析学的重要发现之一。人类隐秘难解的各种心理动因，看似寻常但最奇崛，一旦触发，影响极大且深远，能从童年持续到成年乃至一生。

众所周知，人类作为个体，其童年是动态的、流逝的，是一去不复返的。而在哲学意义上，童年既是个体的，更是普遍永恒的，也是可以珍视、珍藏、追溯和重现的。在一般生命意义上，童年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一方面是由于生存的弱势，儿童不得不依赖作为成人的父母；另一方面是童年精神世界的异常活跃以及随之而来的天马行空、漫无边际的幻想。走进童年意味着认识儿童的特殊生命状态和特殊精神世界。作为人类个体生命中一段特殊的初始阶段，童年本身就具有与成年迥然不同的特殊性，尤其体现在生理发育程度、心智与精神活动差异等方面。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童话心理学为人们解读童话与童年的文化心理联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路径。根据当代童话心理学的研究，在人类的幼年期，儿童的内心感受和体验缺乏逻辑秩序和理性秩序，因此不宜过早让他们进入复杂的现实，像成人一样去理解现实。若用人们的日常话语来说，那就是让孩子过早懂事并非好事，这样做很容易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要求孩子过早懂事往往是以遏制童年的幻想为代价的，这意味着让他们失去幼年期应有的天真烂漫的任性，或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从而压抑了内心深处的冲动，泯灭了天真的童心，也扼杀了走向未来的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童话心理学研究者要大力倡导将富有积极心理意义的经典童话作为推动儿童健康成长的文化资源，提供激发内心成长的幻想来引导儿童超越幼年期。这有助于理解儿童文学的艺术特征：作为童年和童年特质的文学表达，优秀的儿童文学具有

既依托童年又超越童年的特殊双重性，力求在更高的艺术层面再现童年的奇特魅力和无限内涵。这正是科林·曼洛夫（Colin Manlove）所阐述的：“那些为儿童创作的最优秀作品是由那些似乎忘记了自己在为谁而写作的作者创作出来的，因为话语的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如此完美地融合起来；当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驰骋想象，全神贯注于爱丽丝故事时，多少年的岁月流逝都不会使他的光芒暗淡下去”（Manlove, 2003: 8）。由此可见，童话心理学是帮助人们认识童话世界和儿童世界的独特理论方法。

